

● 外语教学: MTI 教学专题

## 翻译理论的本质、价值与危机\*

覃江华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58;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430070)

**摘要:** 翻译理论是对翻译现象的反思和再反思。它在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方面具有多重价值: 对翻译主体而言, 理论有助于突破自身经验局限, 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缩短进入职业角色的适应期, 塑造译者的身份与形象, 改善翻译的社会地位; 对翻译学科而言, 理论是学科建设的基础, 是知识积累、传承和更新的必要途径; 对相关学科而言, 翻译理论日益显现出其跨学科价值, 有助于提升翻译学的学术话语权。后理论时代, 翻译理论研究面临诸多挑战, 如变化的翻译现实与保守的翻译观念之间的矛盾, 翻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张力, 翻译理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乱象丛生等, 但同时也为居于边缘地位的理论话语走向中心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 后理论时代; 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 本质; 价值; 危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20)05-0058-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20.05.010

### The Essence, Value and Crisi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Qin Jiang-hua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further reflections of translation phenomena. Epistemolog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s multifold. Firstly, theories help translators to look beyond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enhance their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shorte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rainees to professionals. They can also build translators' identity and image and increase their social status. Secondly, theories are essential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TS) and the accumulation, inheritance and renewal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irdly, translation theories shed lights on som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TS.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 TS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hanging landscapes and the conservative ideas of transl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strumentalism and the humanism, and the chaos i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Nevertheless, it offer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some discourses to mov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Key words:** post-theoretical era;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practice; essence; value; crisis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追求,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翻译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是外国语言文学5个主干学科之一。过去十多年,翻译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史无前例。然而,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对翻译

理论的本质与价值及其与实践和教学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这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新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翻译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翻译的面貌和译者的身份、地位与权力(Cronin 2013)。传统翻译理论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8M630657)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018T1105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myqin2008@163.com

在解释某些新兴翻译现象时有些捉襟见肘。其次,翻译学术话语创新的科学性、规范性有待提升。后理论时代,翻译理论生产和消费面临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影响到理论的公信力。最后,由于翻译专业教育的实践导向,翻译理论教学在课程学时、教材教法、师资队伍等方面遭遇诸多挑战,学生的翻译理论意识、思辨创新能力和毕业论文质量亟待提升,引发诸多担忧。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翻译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也表现于翻译理论研究的进步(蓝红军 2018a)。因此,对翻译理论的本质与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 1 翻译理论的本质与价值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翻译界曾就翻译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西方译论与中国译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展开多次热烈的讨论(周领顺 周怡珂 2018)。经过这些大讨论,人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不断加深。当前,随着翻译技术、翻译产业、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的突飞猛进,围绕翻译理论及其应用问题,又产生不少新的困惑和争论,甚至出现“理论都是马后炮”“翻译专业硕士毕业论文不需要什么理论”的声音。这表明,在当下翻译界,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本质和价值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 1.1 翻译理论的本质

理论是人类在自身知识和认知水平上,运用归纳、演绎、试推等思维方法,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一般结构、模式和规律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总结出来的学问。英语中理论(theory)一词的本意是“一种观看的方式,一种思考的视角,其目的在于理解”(Chesterman, Wagner 2002:2)。在汉语中,理论有两种主要含义:一是人们从实践中归纳,或由观念推演得来的关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说理或论点;二是与人辩论是非、争论或讲理。这就意味着,理论既是系统而专门的知识,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人类交际和认知行为,是基于人的知识、立场和态度,通过与他人交流互动,求得更为准确认识的方式。人是理性的动物,只有人类才会生产和消费理论。

理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对世界做整体性解释,即通过一整套原理来解释不同领域的现象,其目的在于以不变应万变(陈嘉映 2004:20)。译事必有其道,亦有其理,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些道理日用而不知。因此,翻译理论就是要运用多种思维手段,对翻译现象背后的结构、规律和关

系进行描述和解释。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内在倾向性,有认识世界、影响实践的功能。当然,理论多种多样,有规范性、哲学性、分析性和描写性之分(蓝红军 2015),不同类型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内在倾向性有所不同,而实践的路径和方式也多种多样。人们在谈论理论有没有用,有多少用的时候,不可泛泛而谈,而是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理论,用来指导何种实践。有些宏观理论看似“无用”,实则有其大用。有些微观理论在特定对象上或时空背景下有用,但主客观条件已经改变,可能就显得“无用”。

当前,人们对理论本质的认识还远未达成一致。总体而言,对于什么样的知识总结可被视为理论,存在着的泛化和纯化两种倾向。贝尔曼指出,“翻译是一种能够在思考中打开自身、(重新)理解自身的经验。更确切地说:从起源来看,作为一种经验,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Berman 1999:16)。这说明翻译活动具有反思性和自省性,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化行为(许钧 2012, Pym 2014)。切斯特曼认为,神话/虚构、隐喻、模型、假设和结构化研究项目都可以是所谓的理论(Chesterman 2017)。他甚至提出,不同的翻译本身就是不同的理论,翻译者是理论家(theorist),或学术活动中的观看者(theoros)。这意味着理论与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而,很多人将观点、想法、视角、经验都当做理论来传播和接受,或将未经严密思想审查或充分实践检验的理论当成金科玉律,盲目套用,不顾其产生的背景和适用的场景,从而导致理论的泛滥和庸俗化。

纯化论者认为,翻译理论建构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流程(穆雷 傅琳凌 2018)。虽然有关翻译的观点、想法、视角、经验、模式、假设都是人类思想的成果,但翻译思想不全是翻译理论。“从思想到理论必须历经一系列过程:产生感性认识、确立翻译思想、验证翻译假说和形成翻译理论。”(黄忠廉 2010:77)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淬炼、蒸馏过程,理论才能经受住思想的审查和实践的检验。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 Culler)提出,凡是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该具有4个典型特征:跨学科性、分析思辨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具体而言,理论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具有内在反思倾向(刘亚猛 2006:264)。若以此为准绳,则很多所谓的理论还停留

在思想观点或个人经验的层面。

翻译理论是关于翻译的一种跨学科性、分析思辨性、批判性和反思性话语。翻译经验、翻译观、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体系)、翻译哲学等都具有或部分具有上述特征,因而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翻译实践经验丰富的译者,虽然不一定都能公开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但肯定都有过一些抽象性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翻译观念。他们的翻译行为绝对不是盲目的,其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考量、翻译方法的运用、翻译困难的应对、翻译受众的考虑、翻译传播媒介的选用,及其对翻译职业与译者身份、地位、权利、责任、形象的认识等等,体现出其对翻译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如翻译的主体、对象、环境、目的、功能、原则、方法、标准和伦理等。

皮姆认为,译者一直都在“理论化”(theorizing)。在公开探讨它们之前,这些“理论化”是私人性的,在遇到翻译难题或争议时,私人性思考就有可能转变为公共性理论(Pym 2014:1-2)。故翻译思想普遍存在,但翻译思想不等于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可以是系统全面的,也可以是吉光片羽式的;可以是公开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主观化的。而翻译理论则一般是公开性、社会化、(尽可能)客观化的,其诞生有其独特社会背景,其价值不在于孤芳自赏,而在于社会传播、交流、接受与应用。因此,翻译理论创新必定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运用强大的思维工具,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和反复的实践检验。如此方能建立起一整套概念术语和理论框架,形成内部自洽的理论观点,并确立一定的解释规范,吸引一定数量的支持者。

### 1.2 翻译理论的价值

理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学价值、实用价值和解释价值等(Eaton 1921)。翻译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Holmes 1988),再加上一定程度的规范作用之上。然而,这些功用有时体现得不那么直接和明显,加上“我们多年受传统文化中实用主义倾向的影响,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看它‘有用无用’,对于‘无用之用’或者表面上暂时看不出用途的东西,就认为它没有价值。这个认识本身的偏差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大家对于理论本身的全部价值并没有充分认识,对理论一直存有偏见”(穆雷 许钧 2006:58)。总体来说,理论具有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两种主要价值,可以满足个人、群体、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理论对翻译主体、翻

译学科和其他学科各有独特价值。

对翻译主体而言,理论研究是译者理解翻译现象,掌握翻译规律,提高翻译能力,训练创新思维,改善职业地位和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途径。许钧指出,“研究翻译理论对于提高并指导翻译实践有百利而无一害”(同上:57)。理论研究可以帮助译者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任何译者的文本实践都是有限的,而理论却能超脱个人经验的局限。翻译理论可以解放思想,激发译者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途径。“每个人都需要理论,因为任何行为,如果不是一种反射或纯粹直觉的结果(即便如此),都需要基于某一理论,即某种观看世界的方式。”(Boase-Beier 2010:26)

对翻译学科而言,理论是翻译学知识积累、传递和更新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翻译理论是翻译实践的自然延伸,是技进于道的必然要求。翻译实践的对象和范围是有限的,而人类思想却可以无限拓展。虽然并非所有翻译思想都能形成翻译理论,但却是理论建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从而凸显出其理论性价值。另一方面,翻译理论具有内在实践性倾向,有潜在应用价值,只是不同理论的应用对象和方式不一样。有些理论是超语言、纯思辨性质的,这些形而上的思考,带来的是视野的拓展和观点的洞见,不能用急功近利的眼光来看待(刘军平 2009:VI)。即便是过时的理论也有其学术史价值。当然,理论价值的大小会因时、因地、因人、因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对于物理学和医学而言,学习基本理论知识是理解物体构造和机理,走上工作台进行实际操作的必要前提;对于文学和艺术学而言,理论或许不能提高学习者的创造能力,但未尝不能提高其鉴赏能力。

翻译理论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没有理论创新,学科就无法往前推进。目前,翻译学已经获得认可,未来发展的重点是理论建设(许钧 2012)。没有自身理论体系的翻译学科很难建立,即便勉强建立起来,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占有一定位置,其地位必定是岌岌可危的。缺乏知识积淀和研究主题的学科,不仅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相关学习与研究,而且很容易被其他虎视眈眈的学科所取代,其研究者在职称晋升、课题申报、评奖评优、学科评估等方面难免陷于被动、失声的境地,生计都可能成问题,更不用说主张本学科的话语权。因此,没有持续不断的理论建构、继承与创新的学科是没有未来的学科。对于新生的翻译学科而言,理论尤其重要。

对其他学科而言,翻译理论的价值正日益凸

显。随着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入,某些翻译理论必定会跨界,将解释力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彰显出跨学科的学术价值。目前,谈论翻译的学科,除了哲学之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传播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对这些学科的发展而言,翻译研究成果可以发挥其独特价值。例如,皮尔斯、德里达、伽达默尔、奎因、库恩等哲学家曾“通过翻译而思”来考察哲学问题,生物学家研究遗传信息的转录与翻译,教育学者畅谈语法翻译教学法,宗教学者宣扬翻译转化、灵魂救赎,社会学家分析作为翻译的社会学解释(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as translation),计算机科学开发机器翻译技术,传播学者关心译介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者探讨翻译文学……这些领域都涉及广义的翻译问题,也是翻译理论可以发挥其跨学科价值的潜在领域。

## 2 翻译理论面临的危机

后理论时代,翻译理论面临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仍旧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实践给理论研究提供实际、丰富、生动的素材,理论研究反过来从翻译实践与翻译经验中获得研究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它们之间互为依存,而非互相排斥。”(穆雷 许钧 2006:58)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然而,在当下翻译界,反智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造成不少思想上的混乱。在翻译学已经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今天,主张“理论无用”“理论已死”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其根源何在?出路又在何方?

### 2.1 变化的翻译现实与保守的翻译观念之间的冲突

从根本上讲,真理是相对的。观念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和复杂的人类社会,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有限。即便是对于同一事物,因为立场、视角、背景、价值观的不同,见仁见智在所难免。“翻译学理论也是一种价值陈述,只代表观者的视角,并不全然反映现实。”(蓝红军 2015:17)具体到当下,产生上述争议的原因有多种。首先一点,翻译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人类活动,新信息技术时代的翻译更是日新月异,翻译的主体、对象、方式、工具(手段)、内涵、外延、方向等都发生巨变(谢天振 2015)。翻译理论需要顺应并超越这些变化。“理论无用论”者所忧心的,正是不断变化的翻译现实与保守的翻译观念之间的矛盾。有人甚至认为,当下我国翻译研究已经“误入歧途”,导致主流翻译理

论难以描述、解释和指导主流翻译实践。应该说,这种忧心是有其道理的,但也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事实上,所谓的“理论无用论”“理论终结论”不仅来自于业界,而且来自于学界内部。这一方面是因为反智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理论的特质就是辩论与冲突,其本身就是不同观点冲撞与见解交锋的平台”(孙艺风 2002:5)。有冲突和交锋完全正常,它是理论存在的方式和理由。虽然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Eagleton 2003),但我们认为,其未来更加美好。从历史经验来看,巨变引发深思,而深思带来理论上的突破。理论上有所突破,应用上才会有重大进展。翻译的对象与工具、译者的地位与形象一直都在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之中亦有不变,如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等,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刘云虹 许钧 2016),人们对翻译问题的反复追问也不会变。理论定义人本身,它不仅不会终结,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这一说法有几分道理,但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常青树之所以四季常青,不是因为落叶,而是在不断推陈出新。理论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翻译学科快速发展,理论的焦虑导致一种盲目的创新冲动,致使翻译理论过度繁荣,违背其基本生长规律。很多人都想创建自己的理论,甚至出现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生造出来的理论往往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哲学根基,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就匆匆出来亮相。虽然也有一些新奇炫目的名词术语,思想上却显得贫乏和空洞。这种理论创造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其价值就很成问题,生命周期也不会很长。

要解决这一问题,翻译学者须要走出象牙塔,积极了解翻译技术和翻译产业的前沿动态,尤其是世界百强语言服务提供商和华为、阿里巴巴等国际化领军企业的成熟做法,了解其市场需求、行为特征、行业规则,通过思考、分析、总结和评价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为翻译理论建构提供资源,形成整体性的宏、中、微三环良性互动的译学体系(傅敬民 袁丽梅 2017)。在此过程中,正确认识理论的价值,平衡好其与实践的关系至关重要。诚如许钧所言,“探讨翻译的客观规律,自然就以实践为研究对象,但不能过分机械地理解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其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翻译活动的具体转换方法上,还应有助于人们从哲学高度去把握翻译实质,有意义地发

挥翻译在人类交流和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许钧 1997:7)。

### 2.2 翻译的工具性思维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我国外语界存在工具论与人文论的分野。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出现较大差异。工具论者认为翻译是实现更崇高目的之工具和手段。他们重视功利,强调学以致用,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有论者坚称,翻译理论的作用就是指导翻译实践,不能给实践提供具体操作原则的理论没有任何价值,这就陷入一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陷阱,没有认识到翻译理论的多样性及其价值的多面性。工具论者认为,文学翻译研究虽有其价值,但不应占据翻译研究的中心舞台,非文学翻译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有论者甚至将其上升到对文化资本和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之上,认为非文学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博弈是百花齐放、参与对话,还是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关系。

与此不同,人文论者并不否认翻译的工具性作用,但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文化担当和历史使命。人文论者重视文学翻译,除了传统因素的影响外,还在于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较高。文学翻译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其受众面广,影响深远,对丰富译入民族的语言表达和文化生活至关重要。文学翻译难度大、技巧多,更能体现人的丰富情感、个人风格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而这些最不能被机器替代。文学翻译理论最具代表性和普适性,对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探讨。而且,出于对翻译之美学、怡情功能的重视,人文论者往往会从个人兴趣和文学价值出发强调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反对用“是否有用”来进行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他们认为,并非所有翻译和研究都要迎合市场或取媚受众。专注于某一领域深耕下去,掘井及泉,继承和发扬前人思想成果,充分挖掘语言和翻译的内在规律,其实也是发展和贡献。

其实,人文论者与工具论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在很多方面其立场和态度甚至是比较相似的。例如,他们都非常重视翻译在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是与工具论者的实用主义倾向不同,人文论者带有一种伦理主义倾向。他们警惕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的功利主义,倡导“以历史的目光与开放的视野,从历史发展和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的高度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从而进一步认识与彰显翻译活动的各种价值”(刘云虹 许钧 2016:100)。

人文论者并不反对翻译技术,而是关心技术变革给译者、翻译行业和翻译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深刻反思机器翻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其总体倾向是强调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 2.3 翻译理论生产与消费中的乱象与转机

就理论生产而言,传统翻译理论大多来自翻译家的亲身实践经验。翻译理论家本身就是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翻译学研究日趋专业化和职业化。译者和学者服务的对象不一样,研究的问题不一样,考核评价体系也不一样,因此,理论与实践不统一的现象十分普遍。目前,翻译专业师生不仅是理论的主要消费者,而且日渐成为理论的重要生产者。由于毕业、职称、考核、评估的压力,这些“生产消费者”在短时期内制造出大量所谓的“理论研究成果”。而在很多职业译者眼中,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翻译理论不是已经过时,就是不切合实际。理论研究须要扎根于新时期的翻译实践,深入观察、分析、思考和总结翻译现象,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纸上谈兵的尴尬境地。他们反对一味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或闭门造车。

应该说,这些意见是值得理论研究者重视的。不可否认,翻译理论代表人类认识和理解翻译活动的阶段性成果,其学术观点和运思特征不仅具有学术史价值,而且对于解决当下翻译问题依然不乏借鉴价值,但这些价值是需要重估的。目前,国内翻译研究看似一片繁荣,实则隐藏着不少问题和危机,脱离现实是其一,粗制滥造是其二。迫于“不出版,就出局;不发表,就发霉”的压力,很多学者(学生)戛戛独造,只顾自己撰写和发表论著,不阅读和引用他人研究成果。还有人巧取豪夺、掠人之美,或通过利益交换获得发表机会,甚至直接雇佣枪手代劳。其后果是“作者多、读者少”,学术研究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产业,制造出大量低水平重复性产品,不仅浪费宝贵的学术资源,而且败坏学术风气,对整个学术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影响。

因此有人提出,没有上百万字翻译经验的人,不适合谈论翻译理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值得商榷。首先,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资质与翻译经验多少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次,上述乱象并非翻译学科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因此,其解决之道也必然要从整体着眼,如完善学术评价体系。第三,人类经验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翻译理论必须基于翻译经验,但并非全部基于直

接经验。翻译理论产生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平移征用3种主要方式(蓝红军 2016)。有些理论直接源于实践,自下而上产生。还有些则是通过自上而下或平移征用推导而来。这些推导出来的理论并非没有实践基础,也未必不能指导实践,只是与实践的关系是间接的。当然,自上而下或平移征用理论太多,也容易导致术语的泛滥和思想的贫乏,甚至危及本学科的主体地位。一旦供体学科出现理论断供,受体学科就面临理论饥荒的风险。因此,翻译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是思想的引擎。“正是对各种翻译问题的追寻推动着译学理论的发展。”(蓝红军 2018b:1)翻译理论生产和消费需要关注 and 解决社会重大关切问题,博采众长又自成一体,交叉渗透又保持学科主体性。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理论的危机也是科学革命、范式转型的诱因。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生产和消费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于那些居于边缘地位的理论话语而言实则充满机遇:一是为非西方理论话语逐渐走向中心,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提供机会(王宁 2013)。如今,西方理论生产式微,中国学者必须反思过去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得失,为国内理论研究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本土理论话语的国际化寻找契机(陈后亮 2017)。二是为非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从翻译史上看,文学翻译并非一直占据主流。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研究的矛盾,其实不是文学翻译研究过多,而是非文学翻译研究过于薄弱的问题。当前,新信息技术引领的数字化革命正在改变翻译和翻译者的面貌、权力和身份,这为非文学翻译研究的繁荣提供战略良机。三是为普通翻译学或理论翻译学的发展开拓空间。翻译学已经取得独立学科地位,如果普通翻译理论发展滞后,必定影响整个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各个分支领域各说各话,误解深重的弊病。目前,不少翻译理论虽脱胎于文学翻译,但却试图超越文学翻译的范畴。同样,一些典型的应用翻译理论也声称对文学翻译具有解释力。未来,基于这些理论资源并超越其自身局限,更具完整性和普适性的普通翻译理论研究将大有可为。

### 3 结束语

翻译理论的本质、价值及其与实践和教学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新命题。在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又面临变化的社会现

实与保守的翻译观念之间的矛盾、翻译的工具论与人文论之间的张力、翻译理论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乱象丛生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亟需对翻译理论的本质与价值、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在翻译教育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一番检讨,尤其是要警惕反智主义倾向的影响。反智主义要么过分强调印象式、直觉性经验,要么视野过于狭隘,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或者一味尊崇和维护权威,忽视边缘性话语或来自其它学科批评性意见(Venuti 2019:16),这都是对翻译理论的本质和价值认识不足造成的。总之,世界不断在变,但万变之中亦有不变。对变与不变的把握是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危机是危险也是机遇。只要秉承开放包容的心态,有所继承,有所发扬,翻译理论就能实现化危为机,守正出新。

### 参考文献

- 陈后亮. “将理论继续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 Chen, H.-L. “To Keep Theorizing”: A General Review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n Post-Theor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3).
- 陈嘉映. 何为理论[A]. 思想与文化(第四辑)[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Chen, J.-Y. What Is Theory[A]. *Thought and Culture (No. 4)*[C].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傅敬民 袁丽梅. 新时期我国译学体系化的思考[J]. 外语学刊, 2017(3). || Fu, J.-M., Yuan, L.-M. 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Systematization in China[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7(3).
- 黄忠廉. 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 || Huang, Z.-L. Translation Thoughts Are Not Translation Theories[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0(5).
- 蓝红军. 译学理论何为——对我国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思考[J]. 上海翻译, 2015(1). || Lan, H.-J. What Are Translation Theories for: Reflection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5(1).
- 蓝红军. “理论之后”翻译学的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 2016(5). || Lan, H.-J. After Theory: Towar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6(5).
- 蓝红军.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中国译学理论研究

- (1987 - 2017) [J]. 中国翻译, 2018a(1). || Lan, H. -J. Theoretically 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17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8a(1).
- 蓝红军. 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J]. 上海翻译, 2018b(3). || Lan, H. -J. Problem Orientation: Reflections o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8b(3).
-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 Liu, J. -P.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刘亚猛. 什么是“理论”[J]. 外国语言文学, 2006(4). || Liu, Y. -M. What Is “Theory” [J].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06(4).
- 刘云虹 许钧. 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谈[J]. 中国外语, 2016(2). || Liu, Y. -H., Xu, J. How to Understand the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Creativity of Translation? — A Conversation on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J].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2016(2).
- 穆雷 傅琳凌. 翻译理论建构的原则与途径[J]. 中国翻译, 2018(3). || Mu, L., Fu, L. -L. Construct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8(3).
- 穆雷 许钧. 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许钧教授访谈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1). || Mu, L., Xu, J.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A Interview of Xu Jun [J].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6(1).
- 孙艺风. 理论、经验、实践——再论翻译理论研究[J]. 中国翻译, 2002(6). || Sun, Y. -F. Theor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Re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Theory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02(6).
- 王宁. 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J]. 学术月刊, 2013(5). || Wang, N. Secondary Thought on the State and New Orientations of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 [J]. *Academic Monthly*, 2013(5).
- 谢天振. 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从 2015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谈起[J]. 东方翻译, 2015(6). || Xie, T. -Z. Changing Landscapes and the Repositioning and Re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J].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2015(6).
- 许钧. 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J]. 中国翻译, 1997(3). || Xu, J. Some Thoughts on Theoretic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997(3).
- 许钧.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J]. 中国翻译, 2012(2). || Xu, J.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ts Functions and a Possible Direction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2(2).
- 周领顺 周怡珂. 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西方编辑观述评[J]. 外语学刊, 2018(1). || Zhou, L. -S., Zhou, Y. -K. The Editor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A Review of Goldblatt’s Views on Editing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8(1).
- Berman, A.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M]. Paris: Seuil, 1999.
- Boase-Beier, J. Who Needs Theory? [A]. In: Fawcett, A. et al. (Ed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ialogue* [C]. London: Continuum, 2010.
- Chesterman, A., Wagner, E.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 Chesterman, A.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Theory. Selected Papers 1993 - 2014*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Cronin, M.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Eagleton, T. *After Theo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 Eaton, R. M. The Value of Theories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21(25).
-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Holmes, J. S. (Ed.),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 Rodopi, 1988.
- Pym, A.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Venuti, V. *Contra Instrumentalism: A Translation Polemic*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9.